

孙中山 及其 思想

吴剑杰 等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孙中山

及其思想

吴剑杰 等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中山及其思想/吴剑杰等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 9

ISBN 7-307-03287-2

I. 孙… II. 吴… III. ①孙中山(1866~1925)——生平事迹
②孙中山(1866~1925)——思想评论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2695 号

责任编辑: 张俊超 责任校对: 叶 效 版式设计: 支 笛

出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wdp4@whu.edu.cn 网址: www.wdp.whu.edu.cn)

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 武汉市汉桥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875 字数: 318 千字

版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307-03287-2/K·239 定价: 17.5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买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者,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二章 生平概略	(12)
一 幼年生活	(12)
二 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	(14)
三 立志倾覆清朝	(18)
四 从“乱臣贼子”到革命领袖	(21)
五 深信革命“可及身而成”	(27)
六 第一任大总统的甘苦	(30)
七 奋斗、彷徨、求索	(34)
八 成为共产主义的好朋友	(39)
第三章 与反对君权相联系的民族主义	(45)
一 “夷夏之辨”与种族革命	(45)
(一) 夷夏观念的产生与演化	(45)
(二) 孙中山对夷夏正统观念的利用	(47)
(三) 孙中山对种族革命传统思想的承继	(52)
二 民族主义是适应世界进步的潮流	(55)
(一) 民族主义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	(55)
(二) 民族主义思想的时代意义	(60)
三 反满与民族觉醒	(65)
第四章 与自由平等相联系的民权主义	(76)
一 “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76)

二 驳“只可立宪,不能革命”	(84)
三 实现民权必须循序渐进	(100)
四 五权分立与权能分离	(110)
第五章 与社会主义相混淆的民生主义	(122)
一 善良的愿望——防止贫富分化	(122)
二 空想的理论设计——平均地权	(128)
(一) 平均地权的思想渊源	(128)
(二) 平均地权的具体构想	(137)
(三) 平均地权的空想性	(144)
三 所谓“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	(150)
第六章 三民主义的新发展	(155)
一 “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155)
二 重新解释三民主义	(163)
(一) 关于民族主义	(164)
(二) 关于民权主义	(173)
(三) 关于民生主义	(181)
三 三大政策与新三民主义	(190)
(一) 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思想认识根源	(194)
(二) 关于三大政策与新三民主义的关系	(199)
第七章 孙中山的经济思想	(204)
一 论破坏与建设	(205)
二 “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	(215)
三 “最好行开放主义”	(220)
(一) 批判闭关主义是孙中山开放主义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	(220)

(二) 引进外资必须保持国家主权	(221)
(三) 引进外资必须用于生产	(224)
(四) 利用外资最好采用外商独资形式	(225)
四 宏伟的实业计划	(228)
(一) 《实业计划》的写作	(228)
(二) 《实业计划》的内容	(230)
(三) 《实业计划》未能实施的原因	(239)
 第八章 孙中山的哲学思想	(243)
一 知行学说的新开展	(245)
(一) 何谓“知难行易”	(245)
(二) “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	(250)
(三) 知行的互动与统合	(256)
二 “进化”的自然史观与人类史观	(259)
(一) “太极”与“生元”	(259)
(二) “民生”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	(264)
(三) 人的尊重	(272)
三 “天下为公”的人生观	(275)
(一) “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	(276)
(二) “造就高尚人格”的立国立人论	(278)
(三) “替众人服务”的人生目的	(281)
 第九章 孙中山的文化思想	(286)
一 “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	(286)
(一) 中西兼通的基础	(286)
(二) 文化开放的品格	(289)
(三) 既不照搬西洋,又不盲目泥古	(291)
二 保守固有文明,作成“中西合璧的中国”	(294)

(一) 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道德文明	(295)
(二) 在趋新中守旧,鉴利弊与得失	(299)
三 “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	(304)
(一) 历史之留遗与时代之进化	(304)
(二) 国粹之重光与民族精神之恢复	(308)
(三) 迎头赶上,驾乎欧美	(315)
 第十章 孙中山的军事思想	(321)
一 辛亥革命前的军事思想	(322)
(一) 关注军事问题	(322)
(二) 确立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324)
(三) 武装袭取边城边省和伺机徐图发展的起义战略	(327)
二 辛亥革命后的军事思想	(333)
(一) 武装保卫民主共和	(333)
(二) “没有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	(338)
(三) 以俄为师,创建革命化的党军	(341)
 第十一章 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世界大同思想	(349)
一 孙中山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与影响	(349)
(一) 对菲律宾和越南等革命的同情与援助	(350)
(二) 孙中山的理论和实践对亚洲国家的影响	(354)
二 “大亚洲主义”的影响及其改造	(356)
(一) 接受日本“大亚洲主义”的思想影响	(357)
(二) 附和与鼓吹“大亚洲主义”	(362)
(三) 提出“吾人之大亚洲主义”	(368)
三 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走向世界大同主义	(375)
(一) “民族主义是人类图生存的宝贝”	(375)
(二) 民族主义是世界主义的基础	(379)

第十二章 余 论·····	(384)
附录:主要征引、参考书目·····	(397)
后记·····	(401)

第一章 导 论

孙中山是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急骤动荡的近代中国社会和风云变幻的世界潮流所造就的东方巨人。在中国历史上,能像他那样以自己的政治实践和思想学说影响当时和流芳后世的,屈指可数。

—

孙中山降生前,由英国带头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已迫使统治中国的清王朝打开了封闭的国门,香港被英国割占,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宁波和天津、南京、汉口等一批沿海沿江重要城市被辟为通商口岸,并划定了租界;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商品开始涌入中国市场,造成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的逐步解体,封建的中国开始了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的痛苦而艰难的大转变,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与原有的国内阶级矛盾、满汉矛盾相互激刺,中国社会开始处于动荡不安和变态转型之中。从孙中山诞生的 19 世纪 60 年代起,中国又先后经历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失败、中法战争的失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的失败、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八国联军入侵和日俄战争的浩劫、“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的屈辱。短短半个世纪,战败、屈辱、割地、赔款,呐喊、呼号、流血、牺牲,接踵不断。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中国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经历过这么多苦难,遭受过这么多凌

侮。孙中山经历了这一切,他审视着这一切。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民族的危机一天比一天深,民众的生活处境一天比一天惨,使幼年立志于救国救民的孙中山勇敢地肩负起天下兴亡的匹夫之责,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位历史伟人。

上述孙中山时代的中国和中国人经历的那一切,根源于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向东方的侵略扩张。在所谓“西学东渐”与“西力东渐”的大趋势下,包括印度、波斯、日本在内的众多亚洲国家,也同中国一样,先后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东西方不再隔绝。共同的遭遇和共同反对西方殖民统治的斗争,把亚洲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开始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避免了继续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命运,并且通过1895年的中日战争和1905年的日俄战争,先后打败封建专制的清朝和资本主义的俄国,成为能与西方列强相抗衡的东方强国,被亚洲人视为“楷模”。就在日本维新崛起的同一时期,即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的激化,贫富对立、劳资阶级矛盾尖锐,工人运动兴起,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涌现;帝国主义国内矛盾和国家间矛盾的加剧,导致了1914年世界大战的爆发和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帝国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矛盾的加深,导致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孙中山以博大的胸怀和开放的眼光注视着世界的风云变幻,追踪着世界的进步潮流。他从日本的成功中汲取智慧,从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中摄取营养,真挚地同情和支持亚洲各国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热烈地欢迎俄国革命给中国和全世界带来的新希望。他融贯中西、参酌古今,构筑起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理论体系,指导着中国革命,也影响了亚洲各国的民族

运动,丰富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和孙中山思想与实践的国际性,使孙中山成为那个时代的东方巨人,并被亚洲某些革命者誉为“全人类最伟大的救星之一”。

二

孙中山当然够不上“全人类最伟大的救星”,这显然是出于崇敬心理的溢美之词。他的准确定位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先行者”,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领袖和导师,因为中国近代比较完全意义的、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从孙中山,而不是从别的什么人开始的,因为他为这个革命提出和制定了具有纲领性意义的一整套思想理论和政策措施,并且毕其一生为之奋斗,因为他的思想和实践使他在当时的中国人心目中赢得了无人可比的崇高地位。我们注意到,海外某些学者对孙中山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袖地位表示怀疑的兴趣越来越浓。他们说,“孙中山在兴中会实在没有享有过独尊的地位”,也没有长久地“保持他在同盟会的影响力”;他这个“流亡分子”在海外的活动对国内革命没有重要性等等。他们不同意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独一无二”的领袖,认为至少黄兴应当与之并列,因为“黄兴在同盟会党员中拥有独特的影响力”和“在反清的军事活动中优越的贡献”,还因为有“辛亥时代,世以孙黄并称”和“孙氏理想,黄氏实行”^①的舆论,提出所谓“双领袖”论。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上述理由是否都符合事实,都有说服力,即使它们都能成立,也不足以动摇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因为包括黄兴在内的任何人,都没有为这场革命提供理论思想的指导,都

^① [美]陈福霖:《从九十年度看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载《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上册,第100~101页,中华书局1994年版。

不能代替孙中山对革命进程中的重大问题作出决策,也都不曾像孙中山那样在当时的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三

孙中山的历史地位是时代形成的,时势造成的,他代表的是一个时代,一个群体,一个阶级。当然即使像孙中山这样的领袖人物,也不能摆脱他的时代和阶级带给他的种种局限。他人格高尚,但同常人一样,也有自己的性格方面的弱点,因此他也难免有失误,犯错误,但这无损于他的领袖形象。孙中山不是“先知先觉”的圣人,对他的任何“神化”、“美化”都是不足取的,但因为反对“神化”和“美化”而怀疑他的领袖地位也同样不足取的。孙中山性格的突出优点是自信与执著,他认准的道理和道路,决不轻易改变和放弃,确有“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①的气概,这使他能成为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成就“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这两大“丰功伟绩”^②。但突出的弱点也在于往往过于自信,近乎自负偏执。他早年说过“予及身不成功,中国革命亦归泡影”^③;到了晚年,则自称“是孔子到现在的中国伟大的改革家的直接继承者,如果在我生前不发生重大的变革,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将推迟六百年”^④;他还说过党是人治,不是法治,“所以服从我,就是服从我所主张的革

①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57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②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1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③ 《与罗斯基等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84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④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版。

命；服从我的革命，自然应该服从我”^①。诸如此类“舍我其谁”的话，孙中山说过多次。这种过于自信和自负的性格，有时妨碍他作冷静的反思，甚至委过于人。如对“二次革命”的失败，他认为“全在不听我之号令”，尤其是黄兴“主张是错”^②，说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案发生后，“弟当时即力主开战，克强不允，卒迁延时日，以至于开战即败”^③。这不是革命领袖应取的态度，也不是对这次失败的主客观原因的正确分析，而且也不符合史实，因为孙中山与黄兴一样，开始也主张“宋案”应当“以法律为准绳”，谋求政治解决，直到4月26日两人还联名致电各省议会、政团、报馆，说“此案关系重大，为中外人士所注目……诸公有巩固民国、维持人道之责，想必能严究主名，同伸公愤”^④，寄希望于社会各界对袁世凯施加压力，逼其下台。这是因为过于自信而委过于人的一例。“二次革命”失败，孙、黄等逃亡日本。黄兴等人检讨失败原因，一是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组织严重不纯，二是国民党没有掌握可靠的武装，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处于被动地位；同时也指出宋教仁生前降低党的纲领要求，迎合党内温和派“是一个大错误”，肯定孙中山“手创共和，万流共仰”的功绩。这些意见应当认为是近乎客观实际的分析。可是孙中山却不这样看，他坚持认定革命的失败是党员们不听他的号令，组织散漫不统一，决定重行组党，强调“此次立党，特主服从党魁命令，并须各具誓约，誓愿牺牲生命自由权利，服

① 《在上海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93～394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② 《复黄兴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89、87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③ 《致南洋革命党人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82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④ 《致各省议会政团报馆电》，《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55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从命令”^①。于是有人党誓词载明“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和入党人须于署名下加盖指模手印一类近乎专制、盲从的奇怪规定。有人提出只写“服从中华革命党之总理”，不管他是什么先生；只需口头声明效忠服从，不必打指印，孙中山一概不同意，坚持认为革命是“必须在惟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还说“我敢说除我之外，无革命之导师”。由于孙中山固执己见，黄兴以“前者不够平等，后者迹近侮辱”，不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与黄兴声气相通的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等一批重要人物也均持异议而拒绝加入，结果使他的党成为一种秘密狭隘的宗派集团。这是孙中山因为性格的弱点导致与亲密战友和同志暂时疏离的一例。值得一提的是，一直到晚年，孙中山也不认为自己在这两件事的处理上有什么不妥，这说明一种定型的性格能多么长久、深刻地影响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判断力。

四

孙中山说自己是“职业革命家”，并以此为荣，但他从来没有明确说过他要进行的革命是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革命，只说是“平民革命”，后来又称“国民革命”。台湾地区和海外的某些学者以此作为一条重要论据，否认孙中山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说它是“全民革命”。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说，人类历史上称得上社会革命的只有封建主推翻奴隶主的革命，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主的革命和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因为只有这三种革命才能导致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的质的变化。所谓“全民革命”是不存在的。孙中山自称代表全体平民或国民的利益实

^① 《致南洋革命党人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81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行革命,这同他的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前辈革命家主观上总是以整个民族即“全民”的代表自居的思想没有两样,何况他确实关切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孙中山还说过“中国现在资本家还没有出世”^①,这是他的主观误判,不是客观实际。事实上,在孙中山开始革命活动的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里程;到辛亥革命前后,民族资本已经在工矿业、轻纺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和农业等各个产业部门都有较程度的发展,渐趋于成熟,并且在纺织、面粉、火柴等行业中开始出现兼并和集中现象。对此,大陆学者已有深入的研究^②,可供复按。当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定社会环境中艰难成长起来的,由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本国封建势力的束缚,它得不到正常的发展,在社会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也只有百分之几,非常幼弱,与之相应的中国资产阶级人数不多,并且由于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但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迫切需要一场以正常、独立发展资本主义为目的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足以发动这场革命,因为历史上任何一次真正意义的革命,当然包括资产阶级革命,都是新的生产方式及其代表者在旧的阶级统治压抑下处于幼稚状态,但却已经形成独立的经济力量和阶级力量的情况下发生的。孙中山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能“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发动和领导了这场革命。他钦慕洪秀全反清,叹其没有成功,但决不满足于做“洪秀全第二”,而只是把“反满”作为鼓动起革命风潮的第一步;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才是他

① 《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 参阅张国辉:《辛亥革命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革命的宗旨。他在维新运动趋于高涨的时候,就断言“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①,彻底抛弃对清政府的幻想,勇敢地走上武装反清的革命道路,自己倾家荡产无所惜,世人恶声相加无所顾,“只在赴大义,行宗旨”^②。在欧美各国貌似繁荣强盛,许多中国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尽善尽美的时候,他敏锐地审视着西方政治和经济制度已经暴露的种种弊端和恶果,在主张“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的同时,强调不能把西方的一套“全盘照搬过来”,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文明”^③,并根据自己对中西文化与国情的分析和理解,构想既能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又能避免资本主义固有弊端的方案,使革命后的中国真正成为人人共享文明幸福、人人当家做主的至完美的“头等民主大共和国”。孙中山晚年,将他毕生追求的这个共和国明确地界定为资产阶级共和国。他在亲自审定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述及辛亥革命的目的时说:“依当时之趋向,民族方面,由一民族之专横宰制过渡于诸民族之平等结合;政治方面,由专制制度过渡于民权制度;经济方面,由手工业的生产过渡于资本制度的生产。循是以进,必能使半殖民地的中国,变而为独立的中国,以屹然于世界。”^④这里所说的民族、政治、经济三个方面,实际上就是指孙中山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所要达到的目标,即通过民族

① 《与〈伦敦被难记〉俄译者等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6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 《致吴稚晖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2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③ 《与〈伦敦被难记〉俄译者等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6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④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4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革命、民权革命(或政治革命)、民生革命(或社会革命)的同时完成,使中国成为一个多民族的、民主的、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孙中山为建立这样一个共和国不屈不挠地奋斗了一生。他原以为辛亥革命胜利后,“循是以进”,可望使中国成为这样的共和国以屹立于世界;但紧接着的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统治,使他痛感共和国徒有其名,专制黑暗且更甚于前清。到了晚年,他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得到启示,觉悟到中国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并且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推进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国民革命。循此以进,孙中山有可能一步步接近他所追求的共和国目标,可惜他在作出这些重大决策以后才一年,便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五

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曾经乐观地相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但那是指排满革命,即颠覆清政府。这个任务是在他生前完成了,但它不能称作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因为没有改变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使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真正意义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并没有“及身而成”,因为他长期寄希望于外国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和国内军阀来帮助他完成这个革命,而不懂得恰恰是这两种势力在反对他的革命,反对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到晚年他清醒了、认识了,懂得要“拿出鲜明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懂得要联合社会主义的苏维埃俄国和一切被压迫民族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强权,也懂得了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可是他一去世,他的那个自称嫡传正嗣的继承人蒋介石先生就背叛了他建立在上述一系列正确认识基础上的